



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在乡土社会的存在与意义（六） ——现代背景下的抢花炮

李志清

摘要：抢花炮的引入既是商业活动渗入少数民族山区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进村寨的开放、使传统与现代相连接的作用。在国家的现代性建设中，该仪式性体育经历了几度起落、盛衰轮回。当代乡土生活中的抢花炮，迷信色彩在淡化，娱乐性功能在强化，吸引投资、吸引旅游的成分在逐渐增加，传统“内演”的取向正转为“外演”的趋势。族群建构与认同是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的传统功能，它在现代背景下增加了新的意义——国家认同、整合社区、增强民族自信。通过自下而上的过程抢花炮的规则逐步地完善，对民众现代意识的培养有一定意义。桂北侗乡的抢花炮历史经验表明，现代背景下，传统民族文化表现出的循环与再生。

关键词：仪式；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现代背景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207(2007)02-0037-08

Exist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Ritual Ethnic Sports in Rural Society (6)

---- Firework-Snatching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LI Zhi-qing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firework-snatching is the result of business activities penetrating into the minority areas. To some extent, it has accelerated the opening-up of the minority villages and linked the tradition with modernity.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China into a modern country, the ritual sport has undergone ups and downs. In the contemporary rural life, the superstitious coloring of firework-snatching is fading and its function of recreation has been strengthened. Its role of attracting investment and booming tourism is improving. The traditional “internal performance” is turning into “external performance”. Clanship and identification are the traditional functions of ritual ethnic sports.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the new significance of the state recognition, reorganization of the communities and increase of the national confidence has been added to ritual ethnic sports. Firework-snatching plays a certain role in creating the modern awareness of the masses in the process of perfecting its rule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firework-snatching in Dong Minority Area of north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shows that the traditional ethnic culture has demonstrated circulation and regener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Key words: ritual; ethnic sports; development; contemporary era

本研究的“现代背景”包括3方面的内涵：一是少数民族那种封闭而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社会被商业活动渗透的背景；二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1]的背景；三是现代化^[2]与全球化^[3]的背景。

商业活动使偏僻闭塞的少数民族山区与外界较为发达的地区建立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山区的封闭格局，加强了族际的交往，文化上的借取、融合也得以发生。由于起点太低等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比起其它地方来，桂北侗乡的现代化过程要缓慢得多。尽管该地区还处于比较贫困^①和不发达状态，各项指标远未达到英格尔斯现代化的标准，但政府的现代化努力、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打工潮和近年来国内民族风情旅游的发展，使现代化与全球化之风已吹拂到此处并使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受到影响，这些影响在抢花炮这一大型民间活动上有充分的体现。而且，信息、通讯和互联网也使得侗乡的民族风情逐渐为外界所知，许多

人通过网络相互联络，组成自助旅行团到侗乡旅游，这两年政府和花炮节的民间组织者也利用官方和民间网站大力宣传抢花炮活动，以此为地方作旅游推销。偏僻的侗乡已不再封闭，全球化对本土文化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同时表现在桂北侗乡的传统文化活动当中。

1 历史的轨迹：社会变迁中的命运

许多研究说明，乡村节庆是乡土社会农事活动节奏和经济社会繁荣的产物。花炮节也不例外。桂北侗乡历史上曾经有十几个花炮节，其举办地大多是繁荣的圩镇，如最著名的几个花炮节中，古宜、富禄、林溪是三江历史上最繁荣的集镇，梅林是民国时期县境仅有的两个定期圩市之一。抢花炮的兴起和流变见证了该地的社会变迁。

1.1 自然经济时代抢花炮的引入和流传

一般认为，19世纪中叶爆发的鸦片战争即西方资本主义

注：在三江县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为贫困，本研究调查的3个乡有两个乡属于贫困乡。

收稿日期：2007-05-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TY004）；上海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4ESH001）

作者简介：李志清（1961~），女，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民间体育人文社会学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打破中国长期封闭性发展的格局,是中国通向现代世界的纪元^[4]。但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至少从明代中叶已经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4]。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自明代中叶(16世纪)开始,东南沿海已出现从“农本”向“重商”转化的苗头,由于明朝中期到清朝中叶为防倭寇,中国政府对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基本采取抑制政策,一些闽粤商人开辟内陆贸易通道,其中一些客家人沿都柳江溯河而上,到达溶江河富禄和浔江河古宜一带,商人把这里盛产的木材、茶油通过水路运抵柳州、梧州和广东,再把山区稀缺的盐巴、轻工业品溯河运来,获得极高的利润^[5]。商业活动使偏僻闭塞的少数民族山区与外界较为发达的地区建立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山区的封闭格局,加强了族际的交往,文化上的借取、融合也得以发生。广东庙会上普遍开展的抢花炮活动在当时商业繁盛的集镇古宜、富禄、林溪和定期圩市梅林先后成为当地的传统文化活动。不管是商人带入的还是侗人主动引进的,抢花炮受到侗乡民众普遍的欢迎,抢花炮活动与侗乡人的传统信仰以及村寨人的集体荣誉感自然结合,该活动使当地寨老成立跨村寨的花炮组织,还炮形式的设置又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保证了活动的延续。花炮节使闭塞的山里人聚集到一起,是当地人一年中主要的探亲访友的时机,同时也是重要的信息交流场所,起了一种沟通山里与山外、在商业和村落之间铺路架桥的作用。它既是商业发展渗入少数民族山区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进村寨的开放、使传统与现代相连接的作用。

总的说来,18世纪末到上世纪50年代开展合作化以前,随着商业活动的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封闭性被打破,抢花炮和其它汉文化进入侗乡的过程,是一个侗乡民众主体的自觉和自然的文化借取和改造过程,在引入新的文化因素的同时,传统文化并没有遭到排斥,经过改造的外来文化(例如抢花炮)很好地整合到侗乡的本土文化之中,并且形成了稳定的传承模式,因此是一种成功的文化重构。

1.2 计划经济时代抢花炮的沉寂

在中国古代,历代王朝虽然曾实行过种种文化控制,颁布了种种禁令,然而,帝国的统治力量并未深入偏僻的少数民族乡村社区,社区生活极少受到国家的直接干预,“山高皇帝远”是村寨生活的写照。民国时期国家的行政力量开始渗透到乡村社会,在“新生活运动”^{注1}的背景下,三江县颁布过省、县一级的改良风俗条例^[6],然而,除了“淫祠”普遍被改建为学校之外,那些规定从来未能有效地实行过,人们一直延续着传统的习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飞跃时期。1954年,三江全县进行土地改革,当年秋全县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林业生产运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春全县掀起建立高级农业社的高潮;1958年开展大跃进,村民没有闲暇搞花炮,接下去是浮夸、禾苗搬家、瞎指挥导致的饥饿、浮肿,死亡,山村妇女普遍停经、男人走路都需要拐杖,根本不可能抢花炮^[7]。1961年,大伤元气的山村悄悄搞起了作业组(实际上是搞单干^{注2})。自留地,使人们生活又好起来,吃饱了肚子的村民忘不了抢花炮,次年(1962年)富禄、林溪、程阳恢复放花炮^{[7][8]}。1965年,

全县开展“四清”运动,接下去是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性的仪式时空取代了传统的仪式时空,开会、运动、学习等重新编织了村民生活闲暇与劳作的节奏,社会时空呈现高度政治化的色彩。唱红歌、背语录、早请示、晚汇报也成为少数民族山村村民的日常生活内容。抢花炮等具有民间神话和原始宗教色彩的节庆被取消,各地抢花炮从此销声匿迹。在这一阶段抢花炮的消失,呈现的是这样的主线:没时间→没力气→没权力。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山村传统文化活动的控制由外而内、由松而紧的过程。大跃进时候抢花炮的停止是时间和体力方面的原因,属于客观条件导致的文化主体对传统文化活动的一次主动放弃;“四清”以后抢花炮的再一次停止,则是因为活动被定为“四旧”,属于国家意识形态对村民的自主文化权力的剥夺,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村民都被纳入统一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管理之中,一些不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活动没有可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备受打击的年代。这期间侗乡的许多传统文化由于被压制处于隐伏状态。随着改革开放,国家对乡村意识形态的控制减弱、村民重新恢复原有的生活节奏的时候,传统的文化重新回到了村民的现实生活之中。80年代初开始,桂北侗乡的抢花炮陆续得到恢复。

1.3 改革开放以后抢花炮的盛衰轮回

尽管从土改、合作化、大跃进进入文革,农村的组织结构、风俗习惯、生产方式都被进行了全面改造,但1979年以后的改革才真正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现代化”诸要素才明显渗入到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入加速期,与此同时全球化正在成为日益流行的话语。现代化的强烈冲击和全球性相伴生的本土性中国和社会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着力弘扬是影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的两个社会背景^[9]。在这一阶段,国家的计划体现在宏观调控方面,并不直接干预具体的经营方式和生产过程,而市场作为另一种力量对侗乡的变迁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一阶段的变迁是国家的现代化努力,全球的现代化趋势和村民的发展愿望3种内外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在引进现代因素的同时,也存在传统的回归,表现出多元的特点。

1981年冬,三江全县实行以户为单位的农业联产承包制,开始农村经济改革^[10]。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促使了乡村经济由集体模式向农户经营模式回归,拥有土地固定的使用权和生产的自主权焕发了村民的积极性,生产效率得到提高,生活又恢复了传统农耕时候的节奏。人们有了弹性调度的闲暇时间,老人们到鼓楼聊天、烤火,也议论起恢复抢花炮等传统民间活动。1982年起,抢花炮陆续在桂北侗乡热热闹闹地恢复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侗乡花炮节经历了“热闹”——“降温”——“热度回升”的过程。当国家经过改革开放走出封闭体系之后,农村传统活动普遍出现复兴的局面。改革开放前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侗乡重新恢复的抢花炮活动极为热闹,富禄、林溪的花炮节都要持续4天以上。这种热闹反映的是偏僻的

注1:即国民党于30年代推出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的“新生活运动”。这场“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蒋介石语)是由宋美龄设计,也是国民党建党以来所从事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文宣工作。

注2:本研究访谈资料,录音记录编号:031120LX40M、040223LX40M



少数民族山村村民对娱乐的渴望和民间活动长期受到压抑后的反弹。在访谈中,各调查点的人都向笔者生动描述了那几年花炮节的盛况^[7]。然而,2003年11月我们参加林溪花炮节的时候看到的是只热闹了一天。其他的调查点也基本上是只有一天的热闹。导致花炮节从“热闹”到“降温”主要的因素有打工潮的影响、公路建设的影响和市场经济的影响。限于篇幅,有关的问题将另文讨论。

2003年笔者确定以抢花炮为个案进行博士论文的研究之后碰到许多幸运的事情。2003年11月农历十月二十六林溪举办第六十一届花炮节活动,该花炮节已经4年没办了,上届原是约定3年以后即2002年办的,因时间与县庆冲突,只好“让道”,改在2003年,笔者由此幸运地获得这次调查的机会,下一届将间隔3年,即2007年再举办,我们差点与林溪花炮节擦肩而过。2004年正月初七程阳举办花炮节,这是停了4年之后的花炮节,2004年恢复放花炮之后,准备从此每年都放。这是本调查第二次的幸运。2004年梅林举办二月二花炮节。此前已改为5年两头放(每隔3年放一次)的花炮已经3年没放了,来年将继续放,这是本调查第三次的幸运。2004年三月三古宜举办第十一届花炮节,第十届的花炮节是1999年举办的,间隔4年了,我们幸运地得以参与和进行调查,这是本调查第四次的幸运。富禄的花炮在萧条了几年之后,2004年活动内容增加,热闹情况有所回升。这也是本调查的幸运。就研究的机会来说,碰上这么多的“偶然”实在是幸运,但在这些幸运的调查机会的背后,其实有着某种必然的因素,这就是由于旅游和商业促销以及全球化中本土性意识的加强使传统文化被“挖掘”和“弘扬”,另外也有某些特殊事件的作用。在这过程中表现的是民间与政府共同的发展愿望产生的合力。

近年乡村旅游的兴起,民族文化的价值被人们重新认识,出现许多争抢老祖宗壮大旅游业的现象,这在桂北侗乡的抢花炮上也有反映。FL人认为FL是当然的“抢花炮之乡”,在2004年12月受邀到广州“抢花炮全国邀请赛”上进行民间抢花炮表演的时候,他们自豪地穿上印着“抢花炮之乡”的服装亮相。此外,在调查中,我们听到M地的人嘲笑邻省的花炮节总是出“事故”,认为他们本来没有办“抢花炮”的传统,他们仿效M地办花炮,而且为了抢先机提前半个月举办花炮节,难免受到上天的惩罚;LX人说LX的花炮是最古老的,是有古书记载的,其他的地方没有的;GY人举出县志为据,说明GY的花炮是最早的,以后才发展到县境其他地方,但FL、ML、LX都有人说是因为编县志的人要宣传县城才写成这样,其实GY也仅仅是民国初年(1932年)才成为县治所在地^注,过去它远不如FL和LX繁荣的。笔者在这里无意考究GY是否为三江县境抢花炮的起源地,也无意辨明LX花炮还是FL花炮为最古老的历史真伪,这些议论本身说明目前侗乡人对“抢花炮”也有了品牌意识,并且对“抢花炮”品牌的潜在商业价值也有了相当的认识。

近年来,侗乡抢花炮这一民族体育节庆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契机。八寨是县级贫困地区,但八寨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除了拥有著名的侗族标志性建筑程阳风雨桥之外,民族风情浓郁,抢花炮仪式完整、很有特色。2003年县、乡对程阳八寨进行重点旅游开发,成立了程阳桥景区管理处。

2004年景区管理处出资5000元赞助程阳八寨恢复放花炮。近年来,在景区管理处的支持下,程阳八寨的花炮节年年举办,已经成为春节黄金周旅游的重要节目。2004年富禄筹备乡庆,花炮节是宣传富禄的绝好的机会,因此,乡政府对当年三月三的活动给予了多方面的合作,派出专人帮助花炮节组委会到县各事业单位集资。由于乡政府支持力度的增大,民间组织者积极回应乡政府的意愿,对活动的内容进行了积极的挖掘和创造,丰富花炮节的活动,扩大宣传效果。2004年广州举办抢花炮全国邀请赛,富禄受邀到会上表演民间的抢花炮,这对当地三月三抢花炮活动的宣传、组织和集资活动无疑是一块极有用的“招牌”。正启动小城镇建设的梅林,通过花炮节宣传梅林、招商引资、开展旅游成为民间和政府的共谋。主办花炮节是获取社会资本的极好机会,那些靠智慧和劳动富裕起来的青年深知这一点,通过筹办花炮节,他们为自己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密切了与政府的关系,为自己在小城镇建设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 当代的某些变化特征

民族传统文化浸润中的侗乡抢花炮在现代背景下已经悄然发生了许多变化^[11]。首先是迷信色彩已经淡化,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程度进一步加强。抢花炮古称“还炮愿”,源于古时的放炮还愿酬神仪式,是一种醮会活动或庙会活动。因此许多地方也叫“赶会期”。每逢会期,花炮要放在庙里祭拜,“吃过”香火之后才开始抢,抢得花炮也要进到庙里方可算数。传说,谁抢得花炮,就会获天神赐福,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因而参加者甚众,拼抢极见热烈……^{[12][13]}从抢花炮的形式来看,神灵的惠顾和好运是通过抢而得来的,也就是说,抢花炮活动的设计本身就包涵了人的能动作用,因而从根上说对花炮的信仰不会达到“迷”的程度。在侗乡抢花炮的现场与得炮者交谈中笔者了解到,要能得到炮,一要有运气,二要有力气,三要有智慧,四要有默契和有效的配合,这是大家的共识。每一个得炮者都是经过与数百人的拼抢,靠勇气、智慧和配合得来的。不难想象,经历这样情境获得花炮的人们会深深体会,好运不是光想就能得到的,也不是单靠祈祷可以获得的,它需要运用力量、智慧和团结协作去“抢”(竞争)才能得来。这样的活动有利于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在程阳和林溪对村民进行面访问到“最希望花炮给你什么好运”时,得到的回答基本上是:“带来好生意,开心”,“带来健康”,“给村寨带来荣誉”,“养猪快大”,“打工得钱”等^[7],反映人们对花炮的信仰不是一种“迷信”而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和寄托,人们希望通过劳动得到相应的回报而不是空想和消极期待,得炮的人不是认为自己无需努力就会获得馈赠而是因为相信有神助而更积极努力地工作。这种“信仰真主,同时拴住骆驼”式的花炮信仰不同于那种消极期待神灵降福的信仰,它激励人们行动,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的生活,使人拥有一种积极健康的心态。在桂北侗乡的花炮节调查中,村民在谈到抢花炮的时候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搞热闹”,甚至为了热闹在抢花炮时“留一点给人家”、“放”一两个出去^[8],这种想法和做法充分反映了侗乡人现在更多的是把抢花炮当作一种竞技娱乐,信仰的成分已大大减少。这种追求“热

注:民国年初,古宜镇是三江县乙区(浔江区)区署所在地,1932年,县治从丹洲迁至古宜,从此古宜成为三江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三江侗族自治县县志》)。



闹”的族群心理,反映了抢花炮活动的进一步世俗化。与梅林一些青年讨论得炮会给炮主带来哪些好处时,他们谈到了炮,大家都去贺他,去他家吃饭喝酒,密切了彼此的关系,他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就容易获得帮助。上述种种情况反映,这里的侗族村民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理性农民。人们对于花炮的信,本来就是表达一种意愿,现在参与抢花炮活动除了仍然在乎它的精神安慰和激励作用之外更着重于现世的利益,既在乎它的实际物质回报,也看到它积累社会资本所带来的间接和长远的实际利益。因此,抢花炮活动中表现的信仰不是盲目的相信,而且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出于娱乐和其他实际利益考虑的成分在不断增多。

其次,是现代性进一步凸显,表现为活动组织化、宣传立体化、女子也成为花炮节上的主角。从抢花炮的历史来看,抢花炮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活动的组织机构由简单逐渐变得复杂,由不完善逐渐趋向完善;二是活动程序由简单变得复杂;三是抢花炮由个人的抢炮行为发展到个人雇一帮人抢炮的群体行为,再发展到个人组队、每队固定人数报名参加抢炮或者以村寨为单位形成团队报名抢炮的组织化行为。另外,民间花炮节组织者也仿照现代体育赛事的举办形式,在抢花炮活动的程序上增加了开幕式和文艺表演。古宜作为县城所在地的花炮节,得到政府各方面的支持,活动规模最大、机构也最为庞大,组委会下设的工作小组数量和人数逐年增多。组委会下设宣传组、竞赛组、裁判组、报炮组、保卫组、文艺组、后勤组、财务组、医疗组等20多个小组。民间抢花炮活动的组织化程度提高,还表现在花炮节组织领导机构的产生也有规范的程序,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筹委会经费收支完全透明,张榜公布,接受监督。现实工作的需要促使花炮组织机构不断完善。古宜花炮委员会的裁判组织相当完善,设有仲裁委员,分有竞赛组、裁判组、警戒线、场内裁判、场外裁判、报炮台、引炮与点炮员、检录与记录员等6个小组共50余人。裁判组织的发展和裁判人数的增加,反映了抢花炮的逐渐规范化、组织化。花炮节的信息发布大致有以下方式:(1)标红(贴通告)、发邀请函;(2)人际交往,口耳传播;(3)电话相告;(4)手机短信相告;(5)电视新闻信息发布;(6)网上信息发布。前两种是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花炮节上的随机调查表明,在赶会期的乡民中这是最主要的花炮信息知晓途径。由于电视在乡间的普及,三江电视台为花炮节做的宣传报道也有一定的影响。同样,电话已经进入少数民族山村,通过电话打听消息、通报信息和确认信息已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虽然电脑和互联网还没有进入侗乡人的家庭,但组织者已明白互联网的

宣传作用,在梅林2004二月二花炮节的活动方案中,宣传推介的方式就包括“利用《侗人网》、《三江旅游在线》等互联网站发布消息”和“通过旅行社向外推荐”。桂北侗乡抢花炮活动的宣传上充分体现了时代的变化,立体的信息传播使花炮节的影响范围大大扩展,参加花炮节的群体由赶会期的乡民扩展到摄影旅游者、民族艺术采风者、民族风情旅游者……影响所及突破乡邻,抵达海外。自古以来,侗乡的抢花炮都是男人的竞技。近年来,县城妇女在花炮节中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以往都由男人抬着游行的花炮炮龕(也称炮台、炮架、炮屏),2004年花炮节上都是由妇女抬着游行(见图1)。改革开放以后,古宜设立过两次妇女炮,参加者十分踊跃,其热闹程度远远超过男子抢花炮(见图2、图3)。

第三,“外演”趋势扩大,民族特色有意识地强化。旅游业的发展是全球化的产物,也是使偏僻闭塞的地区开放与发展的一股强大力量。旅游业的发展使现代化的浪潮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包括最边远、最不发达的地区,因为越是原始闭塞的地区越具有旅游者感兴趣的原始文化,因而越有旅游开发的價值。近年来,在桂北侗乡的各个花炮节,人们开始注意“土特产”(乡土文化)的包装。从游炮的情况来看,过去富禄和葛亮放花炮并没有大型的文艺游行,“还炮的人,他的亲戚朋友会打扮起来,高高兴兴地帮他护送花炮来,组委会作为主办者,作为一种礼貌,在他们进镇的时候就请喇叭队伍,放鞭炮、敲锣打鼓去接他,有条件的时候,就舞狮子舞龙去接他。”^注林溪、程阳的花炮节上,上一届得炮的村寨会组织一个隆重的还炮游行,队伍中包括穿长衫的老人、青衣白裤的少年粉枪队和盛装的女子银花队。这些游炮是得炮村寨展示自己的机会,也是青年择偶的机会。家庭殷实的姑娘身上戴的银饰有一二十斤,有的戴不了那么多,母亲就在旁边帮其托着。姑娘身上的侗衣都是自己织、染、缝制的,布织得好不好、染得好不好、衣服的针脚细不细一一展示在众人面前,这种“游炮”是一种自我展演,是展示给“自己人”看的,属“内演”的性质。随着侗乡的旅游开发,主办者越来越重视对外的民族风情展示,古宜、富禄和梅林的花炮节现在都安排大型的文艺游行和表演,2004年富禄花炮节还开发了富有当地传统生活情趣的“大木拉山”节目,梅林也挖掘和恢复了当地的侗族大歌和“抬官人”节目。2003年林溪花炮节虽然还是保持传统的还炮游行,但把村寨各自为政的游炮集中起来增加热闹的程度,吸引游客。由于“卖土特产”,花炮节由较为单一的活动不断丰富多采,许多地方的抢花炮由一个促进商贸的活动,建构成民族传统文化节日,这是民间组织者、政府以及当地民众



图1 抬着炮屏的女子



图2 女子抢花炮的人气



图3 姑娘们抬起自己的英雄



共谋的活动。如今,花炮节的举办既有“外演”的考量——依旅游观光需求演给外人看,也有“内演”的元素——依传统方式自我展演,人们借由仪式的举行和文化展演,表达他们心中祈求的东西,也满足外界对他们的期待。

第四,现代体育元素渗透,活动趋向规范化。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抢花炮成为大会的表演项目,从第三届民运会始,抢花炮被正式列入比赛项目,被媒体称为古老又时尚的东方橄榄球。但是,民运会上的抢花炮除了与民间抢花炮拥有共同的名称、最初使用的炮圈和送炮器相同之外,两者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对负责起草制定民运会抢花炮规则的专家Z先生的访谈得知,民运会抢花炮的规则是参考足球、篮球和手球进行的全新创制^[5]。由于民运会抢花炮与民间抢花炮相去甚远,民间也不具备进行民运会那种正规的抢花炮的条件,因而,民运会抢花炮规则对民间抢花炮并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民运会确定了抢花炮的“少数民族运动”的“身份”,人们也开始注重它的规范化。古宜是县城,在县体育局的帮助下,古宜的抢花炮比下面村寨的更趋向正规并向竞技比赛的方向发展和变迁。例如限定了抢炮的范围和人数、设立警戒区和内外裁判、运动员增加腰部标志、改用铁炮、炮圈增加防伪标志。现代体育元素的渗透使古老的抢花炮有了一些现代的气息,也强化了一些竞技体育的特征。桂北侗乡其他地区的抢花炮虽然规范化的程度不如古宜,但民间组织者都已开始注意强化和完善抢花炮的规则,抢花炮的群众也有完善规则的要求。竞赛的实践使人们体会到,按规则办事争论就会少一些,比赛规则要逐渐完善。桂北侗乡的抢花炮可以说是原生态的体育向正规化的体育转变的活标本,从各地的抢花炮可以看到在规范化的发展中处于不同阶段、不同水平的形态,例如,参加抢花炮从不需要报名到需要报名、从不限制人数的报名到限制人数的报名、从每人不限报一个队到限报一个队等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相应的样本。在抢花炮活动的现实发展中,人们逐渐产生规则的意识以及对完善规则的要求,这对少数民族山区民众现代意识的觉醒是有一定作用的。

第五,角色转换,功能多样化。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传统”有的消失,有的变异,有的新生——从较单一的文化功能,转向多样性的功能。民间抢花炮由最初的一种兼具乡村贸易和娱乐的醮会或庙会活动,在保持和强化贸易和娱乐功能的基础上,已经发展成村寨之间的“荣誉争夺战”、社区整合的一项体育活动,成为民间与政府沟通、民间精英获取“社会资本”以及社区交流和民间外交的机会,通过花炮节的举办和民族文化展示,为本地进行宣传,为本地带来名声,也为本地带来商机,花炮节成为一种可以转换的“象征资本”。近年来,花炮节由单纯的集资办炮,逐渐朝拉广告办炮发展,由单向的慈善式的施舍,逐渐加入经济利益的考量,显示市场经济对抢花炮活动的介入与互动进入更深的层次。从历史来看,办炮的目的有促进商贸、热闹乡里和祈福禳灾等,现在人们办炮,除了不同程度地保留上述目的之外,突出地表现为侗乡民间力量利用花炮节的举办获取“社会资本”、强化自身的力量。侗乡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组织根基的社区,其民间精英特别注重族群的认同与凝聚,抢花炮能满足这方面的需要,因而成为最具活力的传统节会。由于抢花炮被国家

注:本研究访谈资料,录音记录编号:040925NL54M。民运会抢花炮规则参见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官方网站 <http://fm95.cninfo.net>

定义为少数民族体育运动,是民间组织合法性开展活动的极好机会,因而民间精英对此项活动投入了最大的热情,梅林等地还表现出青年人主动接管的现象。主办花炮节可以获得相应的荣誉、声望和他人的遵从,使普通的人际关系网络变为社会组织力量。民间精英们已经认识到,通过活动的举办可以放大自身的资源力量,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抢花炮活动使侗乡从封闭走向交往和互动,是加强社区交流和侗乡对外交流的机会。民间花炮节的组织者还把花炮节作为民间外交的手段。梅林地处三江县的西端,与贵州从江县毗邻,距三江县城90 km,距从江县城却只有19 km。梅林是从江的“蔬菜基地”,整个从江县城70%的蔬菜是梅林供应的。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曾经几番讨论梅林划归从江之事,划归之事先是梅林人不从,后是广西和三江县不放,现在贵州享受国家许多扶贫政策,从江成为国家重点扶贫县之一,发展很快,梅林人大多数都已愿意归属从江。2000年和2005年两届花炮节组委会均邀请从江县领导参加,向他们表达民间的愿望,希望重提划归之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花炮节的组织者也意识到了花炮节的商业潜力,逐渐地从单纯地向政府机关和事业机关集资发展到联系商家的赞助。GY花炮节的游行,成为吸引10万双眼球的流动广告长廊,其价值正在被不断开发。总的说来,民间体育节庆具有许多可开发的价值。抢花炮在桂北侗乡正成为具有经济潜力的民间狂欢节,与经济的结合使它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3 传统功能与现代意义:促进族群建构及认同

族群(ethnic group)是人们在交往互动和参照对比过程中自认为和被认为具有共同起源或世系,从而具有某些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范畴^[14]。族群认同是人们在长期的临界互动后产生的对内对外的心理认同意识,是族群互动的体现^[15],它有利于增强族群共同体的向心力、凝聚力。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常常使用“族群”替代过去习惯所用的“民族”。国家民委的英译名由原来的The State Nationality Affairs Commission改成The 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民族团结》杂志的英译名也由原来的Nationalities Unity改为现在的Ethnic Unity。而且,在外事场合,凡指涉少数民族的地方,原来的nationality改成了ethnic groups。之所以做这样的改动,是因为在国际法律用语中,nationality与nation一样具有表示国籍的“主权意义”,这显然不符合我国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现实,在政治外交和学术交往中往往引起歧义。但是,作为民族—国家(nation)的中华民族,其中至少包含着56个民族,而如果按照族群即英文的ethnic groups划分,可能比这个数量要多^[16]。但由于族群作为文化—心理认同的共同体,更适合学术研究,因此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界常使用“族群”概念或者与“民族”概念结合使用。由于“民族”一词的歧义主要是在翻译上,中文使用这一名词并无问题,因此本文不准备深入讨论民族或族群的定义,也不对两个概念做严格的区别,采纳马戎先生的观点^[17]一般仍按习惯用“民族”概念,但为了学术对话的方便有时使用“族群”概念。

全球性的文化没有社会记忆,也没有历史认同感,而



地方性、社区性、乃至国家和族群的文化都是特殊的、具有历史感、具有共同体的认同情感,能够引发民众共同的价值与记忆,产生共同的命运感。生活在桂北山区的侗族,生活方式的许多方面已经与汉族无异,但却维系并传承着族群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建立在语言、民俗仪式活动等载体之上。抢花炮作为一种跨村寨的多民族参与的民间体育活动,既强化了族群认同又加强了族际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图4 程阳八寨花炮活动主席台

对联:鼓舞八方人民喜地方艺术风格乐得新绣篇章
实践三个代表看民族传统文化欣获发扬光大

3.1 形成集体记忆,建构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

民俗学家刘魁立先生说,“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符号体系,有时候符号的意义比内容还重要。”^[18]记忆有赖于符号,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皆如此。集体记忆是集体认同的前提。^[19]通过仪式的展演不断地强化着人们的集体记忆。侗乡的抢花炮,经国家征用并贴上“侗族传统体育项目”和“东方橄榄球”的标签之后,侗乡民间的组织者也积极回应,有意识地强化抢花炮的侗民族特点。侗乡民间与国家形成共谋推动抢花炮的民族标签化。国家把抢花炮推进民运会,以此作为民族团结的象征符号,民间利用这一符号的建构强化族群认同,同时以民族特征的强化来维持和扩展该活动的生存空间。从人们对抢花炮来历的“结构性健忘”和民运会确定抢花炮为侗族传统体育项目之后人们对花炮节民族特色的自觉强化可以看出,抢花炮已作为族群认同的象征符号,刺激和唤醒侗乡人的自我认同意识。

抢花炮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符号,既是族群记忆表述的载体,也是族群记忆传承的载体。在桂北侗乡,抢花炮和人群姓氏、信仰崇拜、生活习俗等等一起使人们获得并延续其认同感。在程阳的访谈中,问到开放性的问题“什么使你想到自己是侗族?”的时候,得到的回答除了“说侗话”、“侗衣”、“侗戏”、“芦笙”“送新娘”之外,还有一些人回答“抢花炮”(占访谈人数的20%),而在要求“列举3项使全寨团结一心、齐心协力的活动”的时候,列举的活动有抢花炮、赛芦笙、建鼓楼、架桥、修路,其中100%的回答都包括“抢花炮”!在回答“村寨的民间集体活动(仪式)有哪些”时,回答中也100%包括“抢花炮”!这种社会认同对于维系族群凝聚力有重要作用。

抢花炮这项民间仪式性体育活动不仅表现了族群认同的作用,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起到国家认同的作用。在林溪的调查中,村民说游炮有3个庙必须经过的,即使现在庙已废也要经过那个地方。这3个庙是飞山庙、神婆庙和盘古庙。他们说,“神婆庙敬的我们这里的祖先,盘古庙就是敬盘古开天地的盘古了,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注1}在2003年

林溪花炮节上,美俗村的游炮队伍特别地显眼——村民制作了一个很大的“神州五号”模型扛在游炮队伍中。侗乡的民间精英十分明白侗乡的发展依托着国家的支持,民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另外,花炮节的经费全靠从政府部门“赖”来,安全问题也依靠政府的支持,他们说,没有政府的支持,是不可能体面地举办这项活动的。因此,在抢花炮活动和其他活动中,这些民间精英总是有意识地宣传和传递一种国家认同。在扎制花炮节的松门的时候,都表达了对中央政策的认同与支持(见图4)。仪式性的抢花炮活动,通过仪式过程,不仅建构着地方族群的认同,同时也建构着人们的国家认同。

3.2 创造公平与公正的竞争,维护村寨间的和谐

在与外群体的争斗或竞争中往往能明显地加强本群体的认同与凝聚力,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但是,竞争的形式多种多样,群体的边界也会视不同的情境而不同,因此,竞争往往也会造成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侗人的荣誉感非常强。侗族村民平时喜欢在鼓楼聊天娱乐,在这种“熟人社会”网络编织而成的互动频繁的生活圈子中,人们的价值和行为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这种人际交往生活方式容易形成“比”的心态,人们由此也特别注重名声。相互比试的心态有时候产生正面的作用,有时候这种荣誉感和比的心态也会发展到歪道上去,导致一些荒唐的行为。在调查中,我们从好几位老人那里听到一个类似“夸富宴”的故事。此外,我国许多地方都有村寨间争名誉和争夺神灵眷顾的事例,有些为此形成村之间的斗殴^[20]。在侗乡,花炮寓意着吉祥,抢得花炮意味着获得神的眷顾,抢花炮又是一项集体的活动,关系到集体的荣誉,所以大家很重视它。抢花炮队伍的组织以及游炮队伍的组织 and 游炮过程的展示对团结人心、凝聚人心具有很好的作用。抢花炮具有聚合村民形成集体认同的效果,透过这种认同的效果,可以炫耀和显示村寨的实力、提高村寨声望。抢花炮把村寨间对名声的竞争、对神灵眷顾的争夺引导到一项体育活动之中,大家遵守一套约定的规则,承认“抢不过别人就没办法”这种体育比赛的惯例,对村寨间的和谐以致族群内部的团结和谐是极有意义的。

3.3 构筑公共空间,实现社区整合

社区(community)是存在于具有一定边界的地域中的、其成员有着各种稳定的社会和心理的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首先提出社区概念^[21],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先生和费孝通先生等人把社区理论引入中国并创立“社区”这个新词^[22]。吴文藻先生提出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指出“社区”最显著的场域特征是地域性,单位可大可小,小之如邻里、村落、市镇,大之如都会、国家、世界,这一切统统可称为社区^[23]。社区整合是指社区诸要素相互协调成为一个整体并有效发挥社区功能的过程和状态。

“体育是游戏规则制度化的一种娱乐形式”。游戏规则制度化的活动即社会成员按某种约定的规则进行活动^{注2}。民间每届举办抢花炮活动,都会对活动的规则进行讨论和修改。例如,程阳八寨抢花炮的筹委会中八寨都有代表,比赛规则是大家一起讨论决定的,抢炮活动中出现规则上的纠纷

注1:本研究访谈资料,录音记录编号:031121CY

注2:对上海体育学院胡爱本教授的访谈,录音记录编号:0506135SH63M



也是由各寨的筹委会代表商讨仲裁。这种在村落社区的体育活动中共同制定规则所要求的交往就是一种促进社区整合的形式。

社区之所以成其为社区,是因为它是具有内在认同感的共同体,这种认同感是通过特定的仪式和相关的社会组织来获得的^[24]。仪式性的抢花炮活动提供了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间表达、交往的公共空间,强化了社区的“集体意识”和团结精神。通过主办抢花炮这一仪式性民间体育活动,形成了村寨联合体,培养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当地人称公益事业)的热情和习惯,从中产生认同感和文化传承的活力。这种参与公益事业的热情和习惯是村落社会生活的一种资源,侗乡的民间力量正是利用这一资源组织并调动社会力量,使村落的社会生活在一定的惯习秩序下维持和发展。通过抢花炮活动,族群定期地表达其联合与团结,使群体内部的成员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神(神灵逐渐隐退之后,这“神”便是村寨的荣誉)之间的关系由此加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以及对村寨荣誉的追求把人心紧紧相连,有效地起到团结的作用。

3.4 增强民族自信,加倍热爱生活

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关键是民族地区的民众具有本民族的积极认同和民族自信,积极主动地参与本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认同的民族成员积极、自豪地看待自己的民族,为身为民族的一员而自豪。具有消极民族认同的民族成员则以一种悲观、颓丧的心态看待本民族的一切,他们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等充满了自卑,其认同是消极的、被动的。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文化积极认同,需要民族内部的强化,即民族成员共同的行为及成员之间相互的欣赏、赞扬、羡慕,同时,其他民族成员对他们的欣赏也能强化他们的这种积极认同,这是外部的强化。抢花炮活动给偏僻山村的乡民沉闷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提供了他们可以向人炫耀的资本,对于增强民族自信有积极的作用。2003年5月初笔者到富禄的时候,三月三的喧嚣已经过去,葛亮三月二十三的花炮节还未到来,从高安乘船到富禄,下船之后拾级而上到达富禄街看到的是晦暗的色调、残破的房屋和冷冷清清的街道,一派衰败的景象,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溶江河第一富镇。人们告诉我1996年和2000年的两场大水,冲毁了木屋,也泡坏了砖房,我在房东的二楼看到主人用红漆划下的两次大水的水线。街道晦暗的色调就是两场大水的印记。但是这里的人们都很自豪地向我描述三月三花炮节的热闹,描绘那自然展示的民族风情和为这民族风情而来的艺校学生和八方宾客。而且几乎每一位访谈对象都请我三月三的时候再到富禄,林溪、程阳和梅林人也都以花炮节而自豪。花炮节的时候,林溪、梅林的中小学都放假参加,家长们都为自己的孩子精心打扮,织布、染布、做衣、做绣花布鞋、绣花挎包,一套行头要花母亲几个月的时间,穿上节日盛装的孩子们兴奋和自豪的情绪溢于言表,相互的欣赏和夸耀以及游客的赞赏和频频拍照更增添了他们的自豪感。花炮节成了学校进行民族文化教育和培养民族认同感的课堂,学生们自编自练侗族大歌,花炮节的演出使当地濒临消失的侗族大歌获得传承的机会,培养了孩子们对自己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通过抢花炮活动和花炮节民族文化的展演,抢花炮不仅负载着侗乡特有的民间体育传统,而且分享着整个民

族文化的传统。村民在热闹的活动,中获得自我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激发了集体意识,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因此,通过抢花炮建构着民族的认同。同时,花炮节带来的旅游人群使村民获得对民族文化经济价值的启蒙,从而更自觉地挖掘和弘扬民族文化,强化抢花炮的民族特色。

4 小结与讨论:现代背景下的民族体育文化——传统的循环与再生

商业活动使偏僻闭塞的少数民族山区与外界较为发达的地区建立了联系,在加强经济交往的同时加强了族际的文化交往。抢花炮既是商业发展渗入少数民族山区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进村寨的开放、使传统与现代相连接的作用。抢花炮和其它汉文化随着商业活动进入侗乡的过程,是一个侗乡民众主体的自觉和自然的文化借取和改造过程,抢花炮这一经过改造的外来文化很好地整合到侗乡的本土文化之中,并且形成了稳定的传承模式,是一种成功的文化重构。解放以后,这一偏僻的少数民族乡村的社区生活与国家命运有了紧密的联系。“四清”和“文革”期间,尽管国家对山村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改造,表面上“封建迷信”没有了,但这种消失只是表面的,随着改革开放,国家对乡村意识形态的控制减弱、村民重新恢复原有的生活节奏的时候,传统的文化重新回到了村民的现实生活之中,而那些靠行政命令的形式进入村民生活的“新文化”,由于并非主体自觉的选择,没有很好地整合到本土文化之中成为人们自觉的行为,失去行政的依托之后就村民的生活中淡出了。只有主体自觉参与、主动取舍和改造过的外来文化才能生根,并且,与传统文化能够整合到一起的新文化才能获得顽强的生命力。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侗乡花炮节经历了“热闹”——“降温”——“热度回升”的过程。人们对此的解释有交通的原因、年轻人外出打工的原因和现代娱乐的冲击,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古老的侗乡抢花炮活动陷入资金缺乏的窘境。近年来抢花炮的温度有明显的回升。其中的原因与旅游和商业促销以及全球化中本土性意识的加强使传统文化被“挖掘”和“弘扬”有关。在这一过程中表现的是民间与政府共同的发展愿望产生的合力。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尤其是三江开展民族风情旅游以后,各花炮节主办者的主办目的正越来越多地增加吸引旅游的成分。各花炮节举办地的人也都在强调自己的花炮节历史最长、名气最大,并且表达希望更多游客到他们那里去的愿望,对“抢花炮”有了品牌意识,并且对“抢花炮”品牌的潜在商业价值也有了相当的认识。

在乡村受到现代化与全球化之风微微吹拂的时候,这项古老的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活动也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有了许多新的特征:迷信色彩淡化,进一步理性和世俗化;现代性进一步凸显,活动组织化、宣传立体化、女子亦成主角;“外演”趋势扩大,民族特色有意识地强化;现代体育元素渗透,活动趋向规范化;角色转换,功能多样化。抢花炮作为桂北侗乡唯一的跨村落的仪式性民间公共仪式,深刻影响着人民的社会生活,也促进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是乡土社会的“草根力量”显示其存在的重要机会,在抢花炮活动中明显地表现了国家—民间社会的互动。侗乡抢花炮活动的理性化、世俗化、组织化、规范化、传媒的利用、妇女的参与等变化,反映的是现代性所促使的改变;民族特色的强调、功能的扩展则是民间文化在现代化与全球化中



的生存策略,这些变化都是文化主体自觉的改造过程,反映了民族文化的生存能力和适应性以及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的现代价值。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值得关心、扶持、挖掘和利用。民运会的抢花炮为民间抢花炮做了最大的广告。很多人由此知道有这样的活动,民间也利用这一点建构自己,现在他们更注意强化自己的民族特色。这实际上是国家和民间相互的利用。国家利用它作为一个民族团结的符号,强化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民间利用这个品牌的知名度,把它建构成自己的符号。民运会抢花炮为民间抢花炮扩大了影响。对项目本身来说,民运会抢花炮对民间抢花炮朝体育方向发展也有一定的意义——以前他们没意识到这是一项体育活动,民运会以后,民间意识到这是一种体育活动,这一民间项目也在朝体育的规则化发展,趋向于规则化、制度化。民众在活动过程中自发地产生了对规则化的需求,抢花炮的过程中产生争议,为了减少争议就需要形成规则,这种规则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这对民众现代意识的培养也有一定的意义。族群建构与认同是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的传统功能,在现代背景下这一传统功能仍然富有生命力并增加了新的意义——国家认同、整合社区、增强民族自信。抢花炮活动的主办把村落联结为一个社会互动单位,调动了村民共同的行为,密切了内部的联系,形成了各村寨的内部认同,并将其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通过抢花炮形成一种地缘关系。

桂北侗乡的抢花炮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背景下,传统民族文化并不会被“挤兑”,相反,传统的文化遗产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传统的抢花炮仪式都有拜神活动,现在庙宇、神祇渐渐淡出抢花炮的仪式,抢花炮除了娱乐性功能之外,族群认同的功能在强化,吸引投资吸引旅游的成分在逐渐增加,因而,一种“内演”取向的民间仪式性体育逐渐增加了“外演”取向,由此产生出一种根植于乡土的具有新的内涵的仪式性体育活动。因此,在现代背景下,不存在完全封闭的“地方文化传统”。“地方文化传统”与外界的文化交换、交流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现在的乡村活跃着的各种“传统”或者“现代”文化,大多是人们出于功用的考虑进行的“文化再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同时是在经济上能算计、政治上能谋划、文化上能创造的,既有自己的能动性又受到环境的限制”的,“社会的结构变迁过程,就是经济、政治与文化三者复杂缠绕在一起的过程。”^[25]

参考文献:

- [1] 安东尼·吉登斯,胡宗泽等译.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8
- [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3] 文军.传承与创新:现代性、全球化与社会学理论的变革[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8
- [4] 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0(3)
- [5] 三江县委编.三件侗族自治县民族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6] 三江县委编.三江县志[M].民国三十五年版,三江县志办公室2002年翻印,262
- [7] 李志清.乡土·国家·仪式性体育[M].(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待出版)
- [8] 李志清.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在乡土社会的存在与意义(四):民间传承中的抢花炮[J].体育科研,2007(1):1~7
- [9] 王希恩.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解析[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 [10] 三江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三江侗族自治县志[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 [11] 李志清.当代乡土生活中的抢花炮[J].体育科学,2005(12)
- [12] 广西通志·民俗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338~339
- [13] 潘其旭.壮族歌圩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 [14] 潘蛟.勃罗姆列伊的民族分类及其关联的问题[J].民族研究,1995(3):17~28
- [15] 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190
- [16] 周大鸣.族群与族群关系[EB].学说连线<http://www.xslix.com/>,2002-10-31
- [17]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28
- [18] 专家称对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将推动国家认同[N].新京报,2005-04-03
- [19] 李强.符号、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EB].中评网www.china-review.com
- [20] 朱炳祥、夏循祥.变迁中的国家与社会[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29~30
- [21] 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22] 费孝通.略谈中国社会学[J].社会学研究,1994(1):4
- [23] 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研究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 [24] 郑振满、黄向春.文化、历史与国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A].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五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25] Helen F. Siu.Agent 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9

(责任编辑:何 聪)